

# 中原学若干基本问题再思考

◇周书灿 罗诗谦

**摘要:**古代文献中的中原语义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原”语义从泛称到专称的演变,显然与中原地区处于中华文明起源的摇篮和早期国家形成的核心地带,以及在相当长时期中原是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的中心和中原是中国古代主流文化、主导文化的起源地有关。中原学的时间界限可上溯至先秦时期百家争鸣,下限则可以延伸至清末民初。该阶段的中原学中的春秋战国诸子学、两汉经学以及宋代理学,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和核心组成部分,因而其完全可以视为该阶段的中国传统学术主干的中国学,因此,其并非一般意义的地方学术文化。中原学理论体系建构和中原学研究应扩大学术视野,打破地域限制,进一步处理好中原学与洛阳学、安阳学、开封学等地方学之间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下,坚持对历史时期的中原文化批判继承、完善创新,以中原文献整理和研究为基础,开展跨学科、跨区域、跨文化和跨国界研究,以中原历史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中原学才会不断有历久弥新的生命力。

**关键词:**中原;中原学;理论体系

中原学是近年学术界提出并不断受到学者重视的一个新的学科概念<sup>[1][2][3]</sup>。该概念一经提出,就得到了部分学者的积极呼应<sup>[4][5]</sup>。然而,作为一门综合性极强的综合性学科,尚有许多重要的关键性理论问题有待学术界继续作深入的探讨。本文拟对中原学的若干基本问题重新作一番思考,以求教于学术界的同人方家。

## 一、历史时期的中原非一般性的区域地理概念和普通的文化区

在相当长的时期,“中原”并非一个特定的区域名称。如《诗·小雅·小宛》:“中原有菽,庶民采之。”<sup>[6]</sup>《小雅·吉日》:“瞻彼中原,其祁孔有。”<sup>[6]</sup>郑笺:“中原,原中也。”<sup>[6]</sup>“原”屡屡出现于先秦文献中,如《诗·小雅·常棣》“原隰哀矣”<sup>[6]</sup>,《小雅·皇皇者华》:“于彼原隰。”<sup>[6]</sup>《毛传》:“高平曰原。”《诗·大雅·公刘》:“于胥斯原。”<sup>[6]</sup>郑笺:“广平曰原。”《尔雅·释地》则区分说:“广平曰原,高平曰陆。”<sup>[7]</sup>在先秦秦汉时期人们的观念中,“原”应泛指大片广平之地。《大雅·绵》“周原膃膃”<sup>[6]</sup>,周原地处关中平原西部,北倚岐山,南临渭水,形如高阜,乃一片广平之野。

古代文献中,“中原”意即“原中”,尚可另举数例。《国语·越语上》记载句践对国人所言:“寡人不知其力之不足也,而又与大国执仇,以暴露百姓之骨于中原,此寡人之罪也。”<sup>[8]</sup>《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是以贤人君子,肝脑涂中原,膏液润野草而不辞也。”<sup>[9]</sup>《三国志·魏书·郭嘉传》:“然策轻骑而无备,虽有百万之众,无异于独行中原也。”<sup>[10]</sup>通读以上几则材料,不难发现,以上文字中的“中原”并非专指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今河南一带。由此可知,在相当长的时期,古代文献中的“中原”约略相当于“原中”,仅是一个泛称的概念。

“中原”名称从泛称到专称之演变,似亦经历了一段漫长的时期。《国语》卷九《晋语三》记载公孙枝的一段话:“耻大国之士于中原,又杀其君以重之……虽微秦国,天下孰弗患?”<sup>[8]</sup>《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sup>[11]</sup>以上“中原”或与“天下”对称,或与晋楚相对,则此“中原”当为语义相对明确的区域概念的专称,大体相当于今天的黄河中游地区。以后,《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所记诸葛亮《出师

表》中说“奖率三军，北定中原”<sup>[10]</sup>，诸葛亮所说的“中原”，显然指魏国所控制黄河中下游大片地区。谢灵运《述祖德》有“中原昔丧乱”“万邦咸震慑”<sup>[12]</sup>之诗句，同样，“中原”“万邦”对称，学者认为此“中原”当指河南洛阳一带。“中原”语义从泛称到专称的演变，则显然与中原地区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所具有的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进程看，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起源的摇篮和早期国家形成的关键性核心地带。进入文明时代后，中原地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一直是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区。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千岁，土地小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sup>[9]</sup>在《封禅书》中也说：“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sup>[9]</sup>司马迁的以上论断，迄今基本都得到了田野考古资料的印证。司马迁所说的三河地区的河南，在西周王城洛阳一带，西周青铜器何尊铭文称之为“中国”，唐兰先生说：“当指西周王朝的疆域中心，即指洛邑。”<sup>[13]</sup>古人盛赞“崤函有帝皇之宅，河洛为王者之里”<sup>[14]</sup>，“欲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sup>[15]</sup>，完全符合中国古代的历史实际。正因为此，被视为天下之中的中原地区，与其说为“天下之大凑”“道里均”<sup>[9]</sup>，倒不如说说以上地区为“王者所更居”<sup>[9]</sup>的天下政治中心。

正由于“中原”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所具有的特殊的地位与作用，文献中往往“中原”“中国”相混称。诸如《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今夫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欲其霸，必亲中国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sup>[9]</sup>以上是韩、魏所在的中原地区直接称为“中国”。又如，《晋书·五行志》记载西晋时期江南童谣：“中国当败，吴当复。”<sup>[16]</sup>此处“中国”显然是指定都于洛阳的晋朝。《宋史·陈亮传》记载陈亮的话：“荆襄之地……东通吴会，西连巴蜀，南极湖湘，北控关洛……可以争衡于中国矣。”<sup>[17]</sup>和前面两则文献中的“中国”语义类似，陈亮所说的“中国”显然也是指的今广大的中原地区。与此同时，文献中有时也以“中原”指代近代的中国。如郑观应在《盛世危言·议院》中说：“况今中原大局，列国通商，势难拒绝，则不得不律之以公法。”<sup>[18]</sup>以上“中原”与近代的“列国”相对应，则显然以“中原”来指代近代的中国。

历史时期的“中原”是中华文明起源的摇篮和早期国家形成的核心地带，在相当长时期，中原是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的中心，中原还是中国古代主流文化、主导文化的起源地，被认为中原学重要研究对象的中原文化，构成中华文化的源头和核心组成部分。正由于中原地区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具有的独特的地位和作用，和历史上地理范围相对明确的关中、巴蜀、湖湘、荆楚、岭南、燕赵、齐鲁、吴越等区域地理概念不同，中原并非一个一般性的区域地理概念和普通的文化区。

## 二、先秦至北宋的中原学实乃中国学，非普通的地域学术文化

早在中原学概念提出的前后，学术界对某些地域特色极强的地方学的研究对象及学科性质、体系等重要理论性问题进行过大量有价值的探索，其中涉及若干重要地域学术文化的空间范围、时间界限和重点时段问题。如有的学者认为：“所谓‘蜀学’，是指四川地区的学术，其重点在文、史、哲，其核心是思想、理论，它是中国重要的地域学术文化。”<sup>[19]</sup>“其时间上限可考虑大体自蜀国、巴国开始……蜀学研究的时间下限应该及于当今。”<sup>[19]</sup>亦有学者强调，湘学“专以湖南地区的学术思想发展为研究对象”<sup>[20]</sup>，“特别是宋以后的湖南学术史”<sup>[20]</sup>，“其下限大致地确定在清末民初之际”<sup>[20]</sup>。近年，有的学者指出，“徽学是一门以徽州历史文化、特别是两宋之际至民国建立前的徽州历史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区域史研究”<sup>[21]</sup>。严格地讲，以上论述，并非皆为学术界的最后定论，某些论断仍有大量可商榷之处，如既然蜀学是中国传统地域学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蜀学的下限是否应该“及于当今”？但总的来看，学术界普遍认为，以上地方学的重点时段，多自宋代至清末民初。

目前，学术界对中原学的空间范围、时间界限等重要理论性问题的认识，尚存在诸多分歧。有的学者认为，“‘中原学’以中原哲学、政治、历史、文学、艺术、宗教、制度为研究对象”<sup>[22]</sup>，“在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体

系中,‘中原学’既是源,也是流”<sup>[22]</sup>。另有学者认为,“中原学的研究,应以广义的中原概念为基础,以狭义的中原概念为核心而进行布局”<sup>[23]</sup>。还有学者认为,中原学“是对传统中原理学(宋学中二程之洛学)的扬弃,是对冯友兰‘新理学’的‘接着讲’,是以中原历史文化为根基的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sup>[24]</sup>。也有学者指出,中原学“是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这一特定地域所存在的问题为研究对象的专门学问”<sup>[25]</sup>。专家普遍认为,迄今为止,地方学的学科体系尚未建立,尤其像中原学研究,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因此,很有必要在新的学术背景下,对以上观点进行进一步更为深入的思考。如,有的学者说,“‘中原学’既是源,也是流”,“源”和“流”之间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又如学术界既然普遍认为,湘学、蜀学、浙学等学科均属于传统学术阶段的地域学术文化,那么中原学是否属于“对冯友兰‘新理学’的‘接着讲’”的“以中原历史文化为根基的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颇为值得进一步斟酌。

按照学术界对蜀学、湘学、浙学等地方学空间范围、时间界限和重要时段的一般理解,则中原学应指历史时期广义的中原地区的学术文化。然而历史上的中原地区,从未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区。在中华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中原地区是一个八方辐辏的大舞台,“各地先进的文化因素汇聚到中原,经过整合,形成夏商文明,又向周围地区辐射”<sup>[26]</sup>,从而加速着各地区的文明化进程。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长期是大国争霸和戎狄攻略的重要战场。顾栋高说:“春秋之初,宋、郑号中原大国。”<sup>[27]</sup>“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宋郑凡四十九交战。”<sup>[27]</sup>“每当伯功之息,则宋、郑首发难。”<sup>[27]</sup>“盖以其地踞中原,关于天下之故。”<sup>[27]</sup>战国时期魏国徙都大梁,《战国策·魏策一》记载张仪称魏都大梁所在中原地区,“地四平,诸侯四通。条达辐辏,无有名山大川之阻……所谓四分五裂之道也”<sup>[28]</sup>。古人对今河南所在中原地区的军事地理形势作过评说:“河南,古所称四战之地也。当取天下之日,河南在所必争;天下既定,而守在河南,则岌岌焉有必亡之势矣。”<sup>[29]</sup>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原地区作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和军事战略要地,自然也是东西南北文化汇聚和交流的重要地区,笼统地将中原地区作为中原学研究的空间范围,显然很容易掩盖中原文化与周边各地区文化之间相互交流渗透的客观事实,自然也很难全面准确地揭示和反映中原学的真实面貌。

中原学的时间界限可上溯至先秦时期百家争鸣,下限则可以延伸至清末民初。与宋代以后逐渐兴起的湘学、浙学不同,中原学则呈现出极强的保守性和落后的一面。如河南学者即曾实事求是地讲:“河南的学术在明代就已经显示出明显的保守性,这虽然与全国的总体趋势大体一致,但河南表现得尤其突出。这种趋势发展到清代愈加显著,已处于学术低谷,不仅远远落后于江浙诸省,甚至落后于山陕地区。”<sup>[30]</sup>中原学最具特色的时段恰在春秋战国至北宋时期,而该阶段的中原学中有特色的春秋战国诸子学、两汉经学以及宋代理学,均非一般意义的地方学术文化,而是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和核心组成部分,因而其完全可以视为该阶段的中国传统学术主干的中国学。

### 三、中原学学科理论体系建构和中原学研究的几点思考

除中原学,近年学术界还陆续提出了长安学、洛阳学、北京学等学科名称。迄今为止,以上学科的命名似乎仍都或多或少存在一些争议。如有的学者即曾实事求是地指出,“无论在学界抑或在社会,长安学的认可度都存在一定问题”<sup>[31]</sup>。诸如“对长安学的研究对象这样重大的问题,论者的看法都不一样,至于一些小的方面,分歧自然就更在所难免了”<sup>[31]</sup>,“长安学的命题虽说有其合情合理的一面,但也有较为空泛甚至大而无当的另一面。它不像已有的‘敦煌学’、‘红学’那样范围具体,易于把握”<sup>[31]</sup>。与此同时,也有学者主张使用“浙东学术”或“浙东学派”这些同样是历史地形成的概念,而较少使用“浙学”这一更可能含有歧义的术语,或许尤能突出浙江文化自南宋以来所形成的富有区别性的学术特征<sup>[32]</sup>。事实上,以上的问题在中原学研究过程中也同样存在。如2016年12月23日,河南省社科联在郑州召开的塑造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原品牌与“中原学”学科建设座谈会上,有的学者即曾强调,必须把“中原学”的概念和范围界定准确<sup>[33]</sup>;另有

学者指出,建设“中原学”学科必须有系统的理论体系和比较完整的框架结构<sup>[33]</sup>;进一步梳理“中原学”,包括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范畴、基本问题,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问题<sup>[33]</sup>。总之,学者普遍认为,“中原学”研究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总体来讲仍然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从学术角度来研究“中原学”,显然这是一个漫长的,并且非常艰苦的工作过程<sup>[33]</sup>。显然,加速中原学学科理论体系建构,是深入开展中原学研究的当务之急的基础性工作。

笔者认为,中原学学科理论体系建构和中原学研究,应该明确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中原学研究应扩大学术视野,打破地域限制,立足中原,面向世界。中原文化具有很强的开放性,以中原历史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中原学,应该打破狭隘的地域观念,以历史时期的中国乃至世界作为研究背景,才能准确把握中原地区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和早期国家形成发展及中国古代社会演进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如有的学者曾指出,“历史上以河洛地区为中心的中原汉族人民不断南迁,促进了南方广大地区的民族融合,同时将先进的河洛文化带到了南方和沿海地区,赣、闽、台等地的人民与河洛人有着共同的血缘关系,河洛文化对闽南文化、岭南文化、客家文化、台湾文化、赣鄱文化、荆楚文化、湖湘文化、徽州文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sup>[34]</sup>。不唯如此,历史时期中原地区的人口流入、徙出与民族融合问题,历史时期中原文化的跨区域辐射传播与文化间双向交流问题,历史时期诸多重大历史事件及社会治理等问题的研究,也都往往与中原地区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同时又超越学术界所理解的中原地区的范围。

第二,中原学涉及哲学、历史、语言、考古、文学、艺术、宗教、人口、民族、体育、军事、水利、医学、天文、农业等诸多学科门类,具有很强的综合性。以前学术界界定藏学“是研究藏族社会历史和文化等方面的一门综合性学科”<sup>[35]</sup>,随着藏学的不断发展,目前学术界更强调其所具有的“跨学科、跨区域、跨文化和跨国界的特点”<sup>[36]</sup>。目前亦有学者指出,敦煌学的“研究对象以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史迹和敦煌学理论等为主,包括上述研究对象所涉及的历史、地理、社会、哲学、宗教、考古、艺术、语言、文学、民族、音乐、舞蹈、建筑、科技等诸多学科,其学科性质应属新兴交叉学科”<sup>[37]</sup>。显然,同样具有新兴交叉学科性质的中原学,也具有以上学科所具有的跨学科、跨区域、跨文化和跨国界特点,以中原文献整理和研究为基础,开展跨学科、跨区域、跨文化和跨国界研究,显然也是中原学研究未来的学术走向。

第三,中原学与河洛文化、洛阳学、开封学、安阳学等学科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学术界尚无一致意见。有的学者说,现今各式各样的“学”实在太多了,几乎到了泛滥的程度<sup>[31]</sup>。这并非夸张之语,颇为准确地反映出了学术界当下“学科林立”的状况。有的学者评价近年洛阳学研究,“仅仅有概念的提出,而缺乏深层的论述”<sup>[38]</sup>。从已有的洛阳学研究成果看,很多学者对洛阳学研究的对象、时间范围、学科性质等关键性的理论问题,众说纷纭,且大多浅尝辄止。显然,就目前已有研究成果看,要讲清楚中原学和洛阳学等地方学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研究对象、时间范围和重点关注领域是否完全吻合或差异甚远,则显得为时尚早。

第四,先秦至北宋时期的中原文化总体上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和核心组成部分,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毛泽东早就讲过:“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sup>[39]</sup>胡锦涛也曾指出:“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护民族性,体现时代性。”<sup>[40]</sup>只有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坚持对历史时期的中原文化批判地继承,完善并创新,以中原历史文化为研究对象的中原学才会不断有历久弥新的生命力。

#### 参考文献:

- [1]李庚香.中原学[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6.
- [2]李庚香.打造中原学一流学科,奋力建设思想河南:从中原发展哲学的视角考察[J].河南社会科学,2016

(6):1-16.

- [3]李庚香.走进新时代的中原学:构建新时代中原学的历史使命和实践路径[J].河南社会科学,2019(8):1-9.
- [4]张新斌.中原学探论[J].河南社会科学,2017(10):119-124.
- [5]田宪臣.中原学研究范式初探[J].河南社会科学,2019(2):121-124.
- [6]毛诗正义[M]//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北京:中华书局,1980.
- [7]尔雅注疏[M]//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北京:中华书局,1980.
- [8]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国语[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 [9]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10]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
- [11]春秋左传正义[M]//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北京:中华书局,1980.
- [12]李运富.谢灵运集[M].长沙:岳麓书社,1999.
- [13]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 [14]萧统.昭明文选附考异[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
- [15]傅璇琮,等.全宋诗:第九册[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 [16]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17]脱脱,等.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18]郑观应.盛世危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19]胡昭曦.蜀学与蜀学研究权议[J].天府新论,2004(3):116-117.
- [20]方克立.湘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和意义湘学:第二辑[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
- [21]徐国利.徽学学科理论基本问题再研究[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6):23-30.
- [22]关爱和.浅议中原学[N].河南日报,2018-11-08(1).
- [23]王喜成.中原学研究应突出四性构建四大体系[J].河南社会科学,2019(7):59-65.
- [24]李庚香.努力做中国学术的创造者世界学术的贡献者:中原学的诞生及使命担当[N].河南日报,2018-11-08(3).
- [25]张新斌.中原学探论[J].河南社会科学,2017(10):119-124.
- [26]王巍.公元前2000年前后我国大范围文化变化原因探讨[J].考古,2004(1):77-83.
- [27]顾栋高,辑.春秋大事表:卷三十七[M].吴树平,李解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3.
- [28]刘向.战国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 [29]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M].贺次君,施和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5.
- [30]程有为,王天奖.河南通史:第三卷[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
- [31]黄留珠.长安学研究述评[J].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5-6.
- [32]董平.浙学概念及其学术内涵之我见[J].浙江社会科学,2017(9):8-12.
- [33]知名专家学者齐聚郑州研讨塑造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中原品牌与中原学学科建设.[EB/OL]. (2017-01-09)<http://www.hnsl.org/zt/zyx/20190121/5056.html>.
- [34]李乔.河洛文化研究述论[J].地域文化研究,2019(4):73-79.
- [35]中国藏学发刊词[J].中国藏学,1988(1):32-35.
- [36]万果.藏学学科再思考[J].西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2-9.
- [37]郝春文.关于敦煌学之命名内涵性质及定义的探索进程[J].敦煌研究,2019(4):4-8.
- [38]薛瑞泽.洛阳学研究状况及研究走向[J].中州学刊,2018(3):127-135.

[39]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0]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N].人民日报, 2007-10-16(3).

作者简介:周书灿,男,博士,苏州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先秦史、历史地理与学术史研究;罗诗谦,女,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先秦史研究。

(摘自:《河南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